

陆天明 | 经典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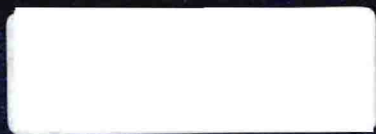


Lu Tianming Jingdian Zuopin Ji

命运 (上)

陆天明 著

Mingyu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陆天明
Lu Tianming
经典作品集
Jingdian Zuopin Ji

命運

陆天明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陆天明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4

(陆天明经典作品集)

ISBN 978-7-5396-5365-5

I. ①命…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0227号

出版人:朱寒冬

扉页题字:陆天明

策划统筹:朱寒冬 岑杰

特约组稿:上海之冠文化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51.5 字数:880千字

版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82.00元(精装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总序)

陈天明

做作家,是幼时的梦想。没人教过我做这样的梦,也没人唆使我去做这样的梦,但,真的,七八岁时,就向往当一个作家。现在想想,确有一点莫名其妙。但也真的就这么背着做作家的冲动和梦想,一直活了过来。到什么时候才认真想过,怎么才算是一个称职的作家?好像至今也没腾出一块正经的时间来做这样的考量和盘算。没有去盘算,大概的原因可能是因了一直认为自己在作家圈里就算是个称职的家伙吧。现在想想,也确实有点可笑:凭什么你就把自己这么个长得有点疙里疙瘩的“大土豆”放进了“称职”这个筐筐里去了呢?我并非不知道这二三十年中国文坛上新潮风起,异议并列,大小圈子各施拳脚,勇争前茅。但我总在想,做文学无非三点: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最后必定还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断是非、黑白、优劣的。二,活着是为了要思想。这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泰纳的一句名言。我始终奉为写作生涯的金科玉律。三,每每剖开自己写过的文字,里头都应有血流出来。这其实是改过了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放在自己书桌上的。他的原话是:“剖开这些字,会有血流出来,那是有血管的活体。”是的,无论怎

样,把文字和文学做成“有血管的活体”,做成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坚持发出自己独到的声音和见解,绝不屈服于各种诱惑和嘲弄,或胁迫。

现在,安徽文艺出版社要把我几十年来写下的长篇小说择其“精要”汇成一个集子,惶恐、感激之余,只能请诸位读者朋友试试,在这些文字里到底能剖出鲜红、灼热的血来吗?

第一章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缓缓隆起的地平线上，躁动地堆积起一层层乌云。同样在这个下午的三四点钟，一八四团团团长关向民心里有点烦。说准确点，应该是很烦，非常的烦。

当时，部队正奉命向紧邻香港的深圳宝安一线紧急开进，去制止边民外逃。而在十分钟前，关向民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说他们连的老兵冯宁表现异常“反常”。这个冯宁因脚伤在团卫生所治疗多日，因始终未愈而没能归队，在这次行动之前，经师党委核准，已被列入留守人员名单；但得知今天部队要出发，仍需拄双拐行走的他，却突然强行冲出卫生所，蹿上个出租车，一路追赶到火车站。当时军列已经缓缓启动。他全然不顾站台上铁路公安的大声喝阻和竭力拦截，扔掉双拐，纵身一扑，钻进八连所在的那个闷罐子车厢里，“死皮赖脸”地随部队一起往南边来了。当时的情形真可以说是惊险万分。就在他纵身一扑，伸手抓住车厢门上那冰冷的铁把手的瞬间，列车突然加速，他的下半身差一点被甩进急速滚动的车轮里。若不是这小子手劲儿足够的大，抵抗住了车轮飞速旋转时产生的那股吸力，他的两只脚，连带两条小腿，肯定就会在车轮和钢轨的无情噬合中轧成了肉酱。且不说由此给他本人的后半生将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更严重的是将延宕阻滞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军区首长在给一八四团传达由军委下达的这次行动命令时，反复强调，深圳紧邻香港，最近处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多年来，许多边民就是利用深圳这个地缘条件，不断

地在此“闯关”外逃。当然,更多的人(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是从邻近的海上泅渡去香港,有人中途被淹死,因而海面上随波逐浪地漂浮起几百具尸首的事情已不止发生过一起两起。边民外逃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已然成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为此,年年大张旗鼓地采取各种措施,内外结合,上下齐心地防外逃,治外逃。但外逃之风却依然像盛夏的韭菜似的越割越盛,越演越烈。在这样的情势下,军委下决心把一八四团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团”拿上去,布防深圳宝安,团党委首先的一条,当然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国境线上修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坚决制止住多年没能堵住的外逃现象,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在这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队伍内部发生任何变故,尤其是不能跑了人。军区首长着重指出,一八四团最后能不能堵住外逃,这取决于众多因素,但是带好部队,决不发生一例官兵外逃事件,是作为一团之长的他,应尽之责,必须做到,也是应该能做到的。如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跑了人,别说跑多了,只要跑了一个,“红军团”这面光荣的旗帜,也就算彻底砸了。“到时候,你关向民少说废话,带着请辞报告回来见我!”所以,在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后,关向民绝不敢有半点疏忽,马上想把这个冯宁找到团部来,严肃认真地谈一谈,摸摸底。

冯宁是个“老兵油子”。关向民不相信他此次“强行”随大部队南下,会是出于“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的高尚动机。关向民做出这种判断,是有他充分依据的。这个冯宁是关向民一个老首长的儿子。老首长离开部队早,转业回东阳老家办教育,两人多年没联系。一直到五年前,关向民带队去东阳市征兵,老首长突然找到征兵办公室,把儿子托付给了他。这个冯宁聪明,肯干,也能吃苦,所有这一切都是没啥可说的。但当兵五年了,却一直没能解决掉组织问题,也就是说一直也入不了党,也没提干。这要是在地方上,也许不算是一档子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在部队上,尤其是在“红军团”这么一个有光荣政治传统的部队里,一个老兵,五年了,既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又提不了干,自己不提出退伍的要

求,组织上也不让他退伍,上上下下都会觉得这样的事非常“怪异”。其实团里早有领导主张让冯宁脱军装走人。但在团党委会上,只要讨论到这档子事,关向民总也不表态。党委的其他领导也都明白老关的为难:冯宁在他管制下,五年没入党没提干,就这样让他走了,他觉得没法向老首长交代。而让人感到更“怪异”的是,直接管着冯宁“进步”大事的营连两级组织,一方面总是反对让冯宁入党和提干,另一方面却又老不让他脱军装走人。这个冯宁虽然好犯自由主义,又有点“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不服管,但是真正交给他个什么任务,他总能完成得很好。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这小子脑袋瓜特别好使,当他来劲儿的时候,经常能给连长营长出一些非常好的点子,帮着营里连里把工作做好,而且在一些后进的战士中,他还拥有一种特别的威望,在关键时候总能让他们不出什么问题,出色地完成某些突击性的军训和生产任务;而且在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后,他还从来不与营里连里邀什么功,不与别人争个什么荣誉,这一点又让营连领导特别舒心。关向民也曾多次找他谈过话,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他,论能力,你完全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把一个连,甚至把一个营带好。只要改掉忽冷忽热自由散漫的毛病,听话,踏踏实实地干,在部队你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冯宁对这个“个人前途”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乎,仍然改不了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认真一会儿又疲疲沓沓的老毛病。所以,在得知他今天突然铆足了劲,冲出卫生所,不顾一切地要跟部队南下到深圳宝安,关向民很自然地凭直觉就断定冯宁此举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阴暗打算”……

让关向民焦虑的还有,一些基层领导完全认识不到部队面临局势的复杂性。他曾找三营八连连长谈过一次话,要求八连连长好好地做一下冯宁的工作。让他先去摸一摸冯宁的思想底牌:“他为什么不顾脚上有伤,拼死也要跟着大部队到南方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你们摸透了?”

八连连长只是一愣,说道:“这还能有什么原因?不就是想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呗。”

团长告诉他:“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八连连长却说：“那还能有什么原因？”

团长说：“你知道我们这回整建制地拉到深圳宝安，要执行啥重大任务吗？”

八连连长说：“制止边民往香港那边跑。”

团长说：“知道香港是个啥地方吗？”

八连连长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团长说：“制止边民外逃，是一场重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如果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反而从我们部队里跑出去一个两个战士，这会造成什么严重的政治影响，我想，不用我说，你也会掂出这里的分量！”

八连连长听团长这么说，反而笑了，说道：“战士外逃？你说冯宁这小子会叛逃到香港？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关向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了一声：“八连长！”

八连连长这才不作声了。

八连连长在团里还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基层干部，而抱有这种认识和态度的连营干部绝对不止八连连长一个人啊！

因为整列军车挂的都是闷罐子车厢。闷罐子车厢之间是互不连通的。要把冯宁从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找到团部所在的这节闷罐子车厢里来谈话，只有等停车以后，才有可能。

傍晚时分，军列行进到一个三等小站，终于停了下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小会儿。开饭，让各连整理一下车厢内务，比如，各连队值勤的战士得赶紧抬着自己车厢里那个沉甸甸的大尿桶，匆匆向车站上那个又小又脏又臭的半露天的公厕跑去，待清空了它，再赶紧将它刷洗干净。趁隙，也让官兵们到站台上透口气清爽的空气，活动活动腿脚。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离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并不远。因为是紧急召见，关向民觉得，即便算上吃饭的时间，七八分钟之内，冯宁也应该能出现在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了。但过了二十分钟，冯宁还没有露头。关向民有点恼火了。这小子完全目中无人嘛！疲疲沓沓到了何种地

步！他马上找来通信员，让他赶紧跑步前去通知八连连长，让八连连长立即带着冯宁跑步到团部来见他。没承想，命令刚出口，还没等通信员转身跑去，值班参谋的哨子声却响在了前边，军列又要启动了。

其实，接到团长第一道“召见”令，冯宁就动身向团部来了。当时他刚打上饭菜，都没等吃上一口，就端着那只军绿色的搪瓷碗，一手攥着两个大白馒头，一瘸一拐地往团部赶。他平时确实有点自由散漫，但五年行伍生活的磨炼告诉他，对于“团长召见”这等大事，还是不能怠慢的，但当时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不大不小的事，也是他想不到，挡不住的。在他紧赶慢赶向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走去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窸窣窣脚步声响，好像有什么人在尾随自己。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回头看去，却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可怜兮兮地跟在他身后，显然是来讨饭吃的。

冯宁稍稍打量了他们一下，便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了他俩。

孩子拿着半拉馒头，欢天喜地地说了声：“谢谢解放军叔叔。”扭头跑了。

冯宁心里有点酸涩，怔怔地目送两个孩子跑远，刚转过身想继续向团部走去，只见从路轨对面的灌木丛中呼啦一下又蹿出一群孩子，把他围住了。他们大都跟刚才那两个孩子一般大小，或七八岁，或十一二岁模样，也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贪婪地看着冯宁手中那个冒着肉片香味的搪瓷碗和剩下的那个又白又暄的大馒头。

冯宁有些为难了：孩子太多，而馒头却只有一个。给谁？这种选择显然会让他陷入另一种“残酷”。一时间，冯宁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连长匆匆走过来催他：“你怎么还不上团部去？”

冯宁忙应了声：“我这就走。”

连长又补充了一句：“别磨蹭。你知道团长的脾气！”

冯宁犹豫了一下，问：“团长这会儿找我，会有啥事？”

连长苦笑笑：“我想肯定不会是表扬你吧。”

冯宁傻愣了一会儿，看着连长走远，又迟疑了一下，把剩下的那个馒

头再掰成两半，分别给了眼前最小的两个女孩，再把碗里的菜肴倒给了一位跟在这群孩子身后、也来乞讨的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身旁还站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也许因为她比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大一些，虽然同样饿，同样需要食物，还是不好意思往前挤。在饥饿和食物面前，居然还知道谦让，这让冯宁特别地看了她一眼，同时也注意到了这小姑娘的清秀和文静，有一瞬间，甚至想把菜给了她，但比较了一下眼前那个老大爷，他还是决定救助更可怜的老人。这时，他忽然间又想起，腰间还有一小袋炒熟了的玉米粉，那是连里发的“备用干粮”，但那袋子的绳结打得太死，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撕解不开，只得作罢，赶紧向团部走去。这么一耽搁，二十分钟就过去了，再往前走了几步，值勤参谋的哨子声已经响起。这时，他本该继续向前快走几步，赶在列车启动前，冲进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去见团长的。换了谁，都会这么干。因为反正连长已经知道他是被团长召去谈话了，回不回连里并无所谓。而此刻见到团长，解释清楚“误会”，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事。但是，冯宁却偏偏做了另一种选择。从本意上，冯宁并不想去应付团长的“训斥”和“追问”。他意识到，团长这时候找他，跟他这回“死皮赖脸”地跟着队伍南来有直接关系。他知道自己此举违规了。他违规自然有他的理由，而他的理由又是没法向别人公开说出口的，尤其是没法向团长那样的“大领导”解释得清楚这个理由。就是解释清楚了，他也并不准备，也不愿意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这个理由。为此，他料想到了团长跟前，自己会相当地难堪和尴尬。正是在潜意识中害怕经历这种难堪和尴尬，在哨子响起的那一瞬间，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向后转身，向着自己连队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跑了过去。他此刻当然不会知道，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居然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生命之路的走向，也给他平添了如此多的坎坷和风险波折。

第二章

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在广州军区大院里同样并不平静。司令员和政委接到省委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首长到南方视察,特别关注深圳宝安一带边民外逃的情况。当天晚上省委要向中央首长做这方面的专题汇报,省委书记钟灵请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参加这个汇报会。司令员向军区作训部部长询问了一下目前一八四团到达的位置,又吩咐了:“通知一八四团,从现在开始,每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沿途情况。到达深圳宝安以后,每隔一个小时报告一次当地情况。”

这时,军区政委已经在大楼前等着他了。

司令员个头不高,身板敦实,为人豪爽,向政委挥了挥手说道:“赶紧上车啊!钟书记来电话催咱们了。”

政委微微一笑道:“走,上我的车。”

司令员一笑道:“干吗要上你的车?”

也许因为身前身后还有一些随员跟着,政委没直接回答司令员的询问,只是笑笑说:“走吧走吧。”

司令员当然知道政委不会无缘无故让他坐一个车走的,一定是途中有话要对他说,便没再追问下去。果不其然,等上了车,政委便神秘地压低了声音问司令员:“知道今天来听汇报的中央首长是谁吗?”

司令员故意问道:“谁?”

政委笑道:“行了吧你!你会不知道?!”

司令员提高了声音反问：“哎，我为什么就一定得知道？”

政委笑道：“还跟我保密？”

司令员诡秘地打量了一下政委，伸出一根粗短而并不笨拙的食指在掌心写了个“邓”字。

政委眉毛一耸，一震道：“真是小平同志？！”

司令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响起，一场特大的大暴雨降临在广州上空。豆粒大的雨点像子弹般击打在这辆黑壳子的大福特车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然后两人便都沉默了下来。马上就要面对邓小平同志，让这两位担负着指挥中国最重要战区之一重任的军政主官不能不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又感到异常的压力。而这种气氛同时也在省委大楼的某几个办公室里传播着蔓延着。特别是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在一个很小范围内，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以汇总各方面的情况和数字。这时，会议已临近结束，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匆匆走进来向钟书记报告，军区那边，司令员和政委已经出发。钟灵忙站了起来：“那好，我们也该过去了。”但他刚宣布散会，省公安厅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忙站起来请求道：“能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吗？”

钟灵站住了。

那位公安厅领导犹豫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钟灵微笑道：“说呀，别让小平同志和叶帅等我们。”

那个公安厅领导还在犹豫。他犹豫的是，在刚才的准备会上，讨论到如何对“边民外逃”事件定性时，让他非常意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是，钟书记居然对多年来一直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持怀疑态度。“在这么多的外逃人员中，肯定有一些是受到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而出逃的。但是，能不能从整体上说，外逃事件就是由于是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就应该把它定性为‘恶性的政治事件’？”钟书记虽然是用一种询问的口气来说的，但他的倾向性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明显地倾向不能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也不能说，

边民外逃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台湾派遣的敌特分子策划组织的。这种倾向性,实质上是对这么多年来一种思维定式的颠覆。钟书记刚到广东,可能还不太了解广东地处沿海,又濒临港澳的全部复杂性。要不要向书记说明这里的一些背景情况呢?犹豫一番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向书记说明清楚才对。“多少年来,从上到下都把这一类边民外逃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是地富反坏右敌特分子煽动组织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不顺着这个思路去汇报,后果难以预料。”他说道。

钟灵沉吟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公安厅领导说道:“如果我们说边民外逃不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万一中央首长追问,那么又是谁在这里起作用?是谁造成这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我们怎么回答?”

钟灵笑了笑说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怎么回答。”

那个公安厅领导:“可是……多少年来从上到下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一直是这么执行的。”

笑容慢慢从钟灵的脸上消失,他知道,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多年所形成的那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和某些固化了的结论,而且眼前也没时间允许他们继续再对此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便淡淡地笑了笑:“咱们总不能把几万几十万逃港人都说成是‘敌人’吧?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确定下来。至于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和政策性问题的,我们暂不下结论。特别是可以听一听中央首长的看法嘛。”

那天的汇报,是在广州珠江宾馆一号楼里进行的。会客厅朴素而宽敞。

钟灵先大概地报告了这些年外逃的基本概况:“在深圳宝安一带,这二十年,具体地说,从1957年开始,后来又在1962年、1972年,曾多次发生这样的边民外逃事件,大批乡民、渔民外逃香港。迄今为止,这股逃港风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制止。而且据情况报告,近期在深圳宝安一带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逃港事件。”

邓小平一直在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插话道：“多少年来，我们这里一直习惯性地把这一类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认为是由台湾国民党敌特分子和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

宋梓南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到小平同志面前，让在场所有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振作起精神，非常关切地看着邓小平，他们都想知道邓小平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出乎意外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他只是默默地朝宋梓南看了一眼，略略地沉吟了一下，回过头来问钟灵：“这些年，前后一共跑了多少人？”

钟灵答道：“关于这个人数问题，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官方的统计，大约为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人次，真正跑到香港去的约有六万零一百多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民间的，那个人数，听起来就有点离谱了。”

坐在邓小平身旁的叶帅问道：“离谱？离谱有多少？”

钟灵笑了笑，把身子往后仰了一下，答道：“一百万哦。”

邓小平和叶剑英不禁都略略一怔。

这时，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赶到了。由中办的同志把他们引领进会客厅。司令员和政委分别向邓小平和叶剑英敬了个礼。

叶帅一边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让他们两位坐下，一边告诉邓小平：“最近有关方面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请求加强深圳宝安方面的边防力量，以制止边民外逃。”

邓小平当时刚复出，还没有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但对军队工作饶有经验的他对这一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立刻反问道：“要求增派部队？”

叶剑英答道：“是的，军委决定调一个团，布防深圳宝安边境一线，力争在短时间内有效制止这股逃港风，给全国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大气候大环境。”

邓小平看看叶剑英，没有表明什么态度。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钟灵：“钟灵同志，听说你最近到边境几个县做了一次实地调查。你说说，你是怎么看待边民外逃问题的？”

邓小平要让钟灵表态,这让省公安厅的那个领导有点紧张起来。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在完全不知道首长的倾向前,要对这么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表态,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万一说岔了,往往会给首长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没有接触过小平同志,也不知道小平同志历来是如何对待在重大问题上与他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公安厅的这位领导此刻还是很为省委书记担心。

素有中央工作经验,也比较了解小平同志为人的钟灵显然从容得多。他答道:“边民外逃的问题,一直让沿海各级党委和政府感到非常头疼,也觉得非常难办。可以说多年来屡禁不止,收效甚微,至今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团结,影响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进行。在怎么看待这件事的问题上,党内也是有争议有分歧的。”

“你呢?你是怎么看的?”邓小平追问。

“如果我们把边民外逃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组织煽动这一点上,有一个问题显然解释不通。”经验丰富的钟灵没有马上从正面回答。

“哪个问题解释不通?”

“这些年抓阶级斗争,抓对敌斗争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在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情况下,为什么边民外逃的现象反而越演越烈?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加以特别注意的,那就是发生边民外逃的地方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当地老百姓的穷困程度,可以说难以想象……解放快三十年了啊,有些景象真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小平同志……”说到这里,钟灵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是的,中央把他调到广东来担任省委书记后,他立即驱车走访了不少的穷困县。实地看到的一些情况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建设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许多农民依然挣扎在饥饿和极其贫困的生死线上。

善于抓问题要害的邓小平立即概括道:“你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太穷了,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也因为我们没做好工作,所以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边民外逃事件?”

邓小平把问题一下提得如此尖锐和明确，倒使钟灵有一点犹豫了。他的犹豫并不是他本人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不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在省内，尤其在中高级干部中，对这个结论还持怀疑，甚至是排斥态度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怎么说，才既能向小平同志说清楚这个情况，又能说得比较得体呢？

这时，在场的人一下也都有一些紧张起来，他们关切地看看钟灵，更注意地看着邓小平。他们想知道邓小平的态度。

省委副书记宋梓南特别注意地看着邓小平。前不久，他曾经陪同叶帅去下边一些县市转了转。叶帅痛心地对这位省委副书记说过这样的话：“梓南啊，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百姓生活得更好一些呢？我们是共产党啊。解放三十年了啊，不能再让老百姓这么穷下去了。”当时他无话可说。

这时，钟灵也怔怔地看着邓小平，希望他能明确表个态。

在座的其他领导这时也都把期待的目光都转向了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邓小平却收回了询问的目光，低下头去沉思了，稍稍坐了一会儿，本能地伸出手去拿起一支烟。

一位同志赶紧拿起火柴，划着火，递了过去。

邓小平拿起了烟，但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缓慢地、本能地按捏着手中那支精制的熊猫牌香烟，似乎没有看到对方递过来的那根火柴。

那位同志当然不好意思去打搅邓小平，只是拿着那根燃烧着的火柴，不无尴尬地在一旁呆坐着。不一会儿，火柴快燃到头了，他只得悄悄地把它扔了。

这时，宾馆的主管领导走上楼来，走到会客厅门外。中办一位穿中山装的秘书上前迎住了他。

那位主管领导低声地问：“晚饭准备好了，我们来请示一下，首长什么时候用餐？”